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

师建军 付奋奎**

【内容提要】 20世纪30-50年代初苏联当局通过镇压富农运动和强制迁移诸多少数民族,人为地在国内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官方文件称之为特殊移民。苏联国家档案馆原始统计资料显示,其间被政府强制迁移的特殊移民达600万人左右。目前,关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成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它的目的方面提出了各种观点。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特殊移民政策出台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斯大林的心理、个性和善恶价值观等深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关键词】 苏联 特殊移民政策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512.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5-0086-(07)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当局通过实行特殊移民政策,主要以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方式,人为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一个特殊阶层,即当时官方文件中所谓的“特殊移民”。

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其它特殊人口优越,但又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不经相关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

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特殊移民政策是由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家领导层一手制定和实施的。那么,斯大林为何要发动这场特殊移民运动?

从当时公开的政府言论中我们可归纳出如下几种说法:1/为了使劳动农民摆脱“富农的剥削”。2/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全盘集体化。3/维护国家安定,惩治法西斯帮凶,清除

* 该稿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610040)中期研究成果。

** 师建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院2005届世界史专业博士生。付奋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院2002届世界史专业硕士。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间此类人口共有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 [俄] 阿·阿·索科洛夫,《古拉格: 1918-1954》,莫斯科,1995,第173页),被内务部各机关动员迁入劳动军的特殊人口——400万,被送进检查-过滤营的——超过200万人,被送进战俘营的——440万人(其中在苏联各工业企业强制劳动的有180万人),被拘留者——约27万人(参见: [俄] 阿·阿·索科洛夫,《古拉格: 1918-1960》,莫斯科,2000,第281页)。

根据斯大林的授意,1930年1月26日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强制迁移被没收富农的决议》(参见谭继军:《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匪患。^{[1](P281)}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根据相关解密档案提出如下四种解释:1/镇压国内反对派,为农业集体化扫清道路;^{[2](P126)}2/平衡东西部人口,开发东、北部边远地区;3/特殊移民,尤其是整体驱逐诸苏联少数民族,与斯大林的个性好恶密切相关。4/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而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1](P283)}

国内学者直接研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著作和文章目前并不太多。一般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斯大林为了落实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而对不“听话”农民所实施的一种超经济强制和政治镇压举措,进而利用从富农那里所没收的资源组建集体农庄,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

上述就苏联特殊移民缘起所提出的观点,有些明显存在谬误,如苏联当年官方报纸所言,特殊移民是为了使农民“摆脱富农的剥削”。事实上,截止20年代末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富农在1918-1920年间的内战中已几乎被消灭殆尽。特殊移民期间当局所谓的富农大多都是新经济政策以后迅速致富起来的中农。他们且尚未发展成为一个阶级,充其量只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商品生产者。^{[3](P16)}另外,有些说法则过于极端,如种族灭绝等。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无疑具有促进民族融合的目的,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上难免急功近利,但要说他实施种族灭绝则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一些原先极其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还是有长足发展的。^{[4](P402)}

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无疑对揭示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原因作了有益的尝试。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要更全面地、更深层次地解释这一问题,还应从斯大林模式与俄国历史传统的延承关系、斯大林对俄国农民、民族和暴力运用等问题的错误认识,斯大林的心理、个性和善恶价值观等角度来加以探究。

一、斯大林模式是俄国动员型社会传统发展模式的延续,特殊移民政策是斯大林模式的必然要求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是历史的一种延续。要研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缘起,就首先有必要探究它的历史源头。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世界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可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进化型、创新型和动员型。进化型乃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依靠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相应条件的逐渐成熟,没有人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意识地干预。创新型和动员型,则是依靠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有目的的干预,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创新型是指有意识地培植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利用科技等手段提高社会生产率和扩大社会成员的实际消费水平,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快速均衡发展。与创新型社会不同,动员型社会一般是对外部强烈刺激的反应,是一定地缘政治和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通过人为地对经济制度进行有意识干预的方式,来使发展停滞或陷入危机的社会适应变化了的现实世界。它往往采取特别的措施来达到特别的目的,以使现存社会制度得以延续。

从历史来看,俄国具备动员型社会的一切特征,其社会发展一直都在遵循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在运行。其特点如下:第一、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占据头等地位,中央集权国家在提出发展目标的同时,往往会以各种强制、监督、控制方式来迫使社会各阶层来实现这些目标。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举措经常是低效率的,而且还会以自然资源的浪费、广泛地使用强制劳动和大量生产军品为代价。第二、国家发展的目标常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而这些目标又往往超越国家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由于不反映社会经济内部的发展趋势,国家就仍以旧的社会经济方式来运作,并诉诸于自上而下的培植政

比如,王晓菊著,《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9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谭继军:“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冯佩成:“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等。

目前中国学者对苏联特殊移民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即一般认为,苏联特殊移民只包括连续集体化运动中被发往特殊移民区的那一部分农民,实际上苏联特殊移民还应包括30-50年代被当局强制驱逐的各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人口(参见《40-50年代民族迁移的后果——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内务部档案资料》,1991年,《苏联历史》,第1期)。

策,以达到强化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进步”结果。第三、政治经济改革的契机多与军事有关。第四,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统治文化和被统治文件之间的巨大差异。文化的相互不理解为社会动荡制造了隐患,一遇到适当时机,受压抑的社会下层就会如火山喷发般发起动乱或革命。第五,社会发展具有周期性、循环性,俄罗斯国家周期性地表演着“腾飞”和“垮台”的悲喜剧。每一循环周期都包括同样的三个阶段:“动员”、“正常发展”和衰败。

沙皇俄国时期强制移民的事件已是屡见不鲜。西伯利亚是集中俄国各类流放民——流刑犯、政治流放犯和宗教流放民等的场所。^{[51](P15)}现代俄国最大的移民活动发生在一战时期,当时共有几十万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等被当局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驱赶至帝国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区域。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中包括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遭到过沙皇政府的流放,其中便包括斯大林本人。^{[61](P8)}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也曾有过强制移民的实践。如,1919-1921年苏俄政府驱逐了部分哥萨克人。

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传统的结合产生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革命必须在它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必须依据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否则,革命将不会达到自身的目的,甚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历史的笑料。然而,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偶然性的事件经常扮演着历史的主角。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主义革命却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条件均落后于西欧的俄国获得意外成功。

1920年代随着列宁的去世,俄共党内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通过使用各种手段,精于权术的斯大林先后击败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为首的左派和布哈林所领导的右派。在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同时,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进而确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所谓斯大林模式,特殊移民政策也逐渐形成。历史经验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的强制移民活动——强迫移民并没收其财产,随即成为了俄共(布)“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论历史学家对斯大林有多少指责,却没有理由怀疑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真诚和忠实。但要在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诸原则,斯大林却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两难问题:或者坚持其既定纲领而被推翻,或者根据现时条件改变纲领而维护革命,但这一革命已失去了既定的内容。面对一个刚刚脱胎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饱受世界大战及国内战争之苦的旧俄罗斯,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苏联被列强颠覆的危险,在短时期内赶上西方国家,斯大林提出了斯大林模式,并像沙皇时代对付战争一样,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将土地、工厂、资金等生产资料完全地控制在国家手中。

斯大林迫于现实而提出的斯大林模式,其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使人很容易回想到旧俄罗斯,并发现二者的惊人相似之处。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所有制与俄罗斯的村社制度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国家的最高所有权;斯大林组织大规模的统一的经济建设与沙皇时代大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都是一种大规模的公共工程。

斯大林模式既是对列宁前期思想中一些关于资本和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论断;内战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等)的继承和扩展,同时也是对其后期理论创新(如新经济政策)的否定,其特殊移民政策是俄国动员型发展模式的延续。首先,斯大林模式把一个政治上相对集中的苏联最终变成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把诸如纪律、集中、恐怖、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等否定性的价值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理论根据,把列宁在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无限扩大,使镇压规模不断升级,民主形同虚设;第二、经济和军事上以外部威胁和国家的落后状态为借口,确立了高速工业化、集体化和军事化等国家发展战略;第三、意识形态上提倡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一切以国家为中心,强调运用行政命令手段,调动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完成国家所设立的既定目标。第四,主张将农业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原始积累源泉,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强迫其加入集体农庄,对于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使用强制手段,均当作富农予以经济剥夺,并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

斯大林模式不像创新型发展模式那样,主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革新科学技术水平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是通过社会组织,行政命令,凭借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斯大林要在文化水平严重落后的俄国,加速实现工业化等一系列超前性的目标,客观上便要求采用粗放性的人海战术。由于历史、气候和历经战乱等原因,地广人稀一直是制约俄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于是,斯大林在借助全盘集体化和公有制企业将工人和农民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的同时,便必然要人为地在社会上制造了一个包括特殊移民在内的“特殊人口”集团,以满足国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大量需要。特殊人口在苏联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仅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苏联内务部所属企业中特殊人口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便占到同期苏联国民总产值的10%。^{[7](P136)}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的产生是俄国历史传统的延续,是斯大林及其战友为苏联所选择的极权主义-动员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

二、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经典论述的教条式理解,对俄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是特殊移民政策出台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论述认为,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无产阶级最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对这些经典思想的片面理解,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对俄国农民阶级的成见,都是促成斯大林实施流放富农政策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否认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键问题。虽然列宁曾经对农民的私有观念十分恼火,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认识到在苏俄离开占人口多数的小农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并肯定说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列宁认为,必须承认和尊重农民利益,扶植小农生产,在农村大力开展文化工作,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程度上说,新经济政策便是列宁这一新思想的某种贯彻。可是,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1929年中止了新经济政策,按自己的模式搞了工业化和集体化。

其次,不相信农民。他在《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专门讲到农民问题,但只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并论证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个后备军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后来,在同布哈林辩论时,斯大林指责布哈林代表富农利益,说自己代表贫农利益,那么,谁代表中农利益呢?斯大林没有说。他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跟托洛茨基一样,思想上都不相信农民。

最后,斯大林不承认农民有不同于工人的特殊利益,更不尊重这种私人利益。列宁所说的农民利益,是指个体私有者的利益,即农民通过劳动发家致富而获得的利益。可斯大林担心富裕会导致农村的分化和富农力量的增加,从而想方设法不让农民富起来。他批判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等口号,认为发家致富是私有者心理,是资本主义心理,不利于农民本身。斯大林虽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个体农民经济,但认为加快发展工业更重要,说这才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只讲农民和工人长远利益的一致,忽视甚至否认农民的特殊利益和私人买卖利益。

由于以上错误认识,导致斯大林在政治上将农民置于二等、从属地位,经济上根据“贡赋论”强迫农民成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源泉。他要求彻底消灭农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迫所有农民都参加集体农庄,并将所有拒绝参加集体农庄者,都打成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死敌,或予以坚决消灭和镇压,或作为富农,在从经济上剥夺之后,强制迁往国家偏远的特殊移民区。

斯大林之所以发动针对诸少数民族的镇压活动,并将其作为特殊移民强制迁往国家边远地区,与斯大林对苏联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第一,斯大林用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来衡量民族问题,坚决反对各民族的分裂、分治或者“单干”,主张由党把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统一起来,从而使苏联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这两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民族权利形同虚设。例如斯大林在回答社会民主联邦主

义的主张时便说道：“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8](P30)} 斯大林认为，“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那要看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了多少而定”。^{[8](P35-36)} 第二、斯大林教条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将得到彻底解决的思想。他没有意识到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民族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特点。他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民族矛盾的化解作用，只是把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彻底割除民族保守意识的天然武器，因而在处理民族发展过程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的矛盾时便表现出急躁和简单化的倾向。第三、斯大林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过分显示自己“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也就更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关于此，列宁曾批评过斯大林：“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作得过火”。^{[9](P757)}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对他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P756)} 第四，对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矛盾作出简单化的理解，提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革命民族和反动民族等理论。

基于以上对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导致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具体包括：其一、以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以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战时出现的民族问题；其二、以事实上的“集权政治”代替“联邦制”；其三、以国家利益代替民族要求；其四、以逐渐增长的大俄罗斯主义代替了民族平等、尊重、互助的民族关系，以“传统、俄国式”的漠然对待新形势下出现的民族问题。

马列主义关于暴力的使用等方面的一些原则表述，无疑也对斯大林出台特殊移民镇压政策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问题曾提出过许多激进的阐释。例如，弗·恩格斯就曾这样写道：“如果不涉及道德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革命者而言，不论是暴力的，还是最平和的手段都一样，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10](P276)} 弗·伊·列宁也曾说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场最无所顾忌的和毫不留情的战争”。虽然同时他也要求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要学会自制、要有纪律、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和统一的意志”。^{[11](P6)}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还有很多关于在采取暴力时一定要果断、坚定，不得有任何软弱和动摇等方面的表述。诚然，就他们的本意而言，社会主义的本质虽不忌讳使用暴力，但其社会-政治目标客观要求革命者尽量采用人道的手段，暴力只是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作为报复性措施才可采用，而且要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按说，斯大林完全可以用上述马列主义的奠基性道德原则来对自己的镇压政策加以限定和约束，可他却走向了极端。他不但未约束自己的行动，反而超越了这一原则。他所采取的暴力手段远非都具有报复的性质，而且大都远远超出了道德允许的“预警”范围。他所预防的那些所谓罪恶活动，事实上大部分并不存在。他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远非都是必要的，而且很多均纯属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动用如此之大的规模和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为了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一些抽象的概念而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这就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指出，“他（斯大林）对人民的评价很高，但却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12](P15)}

斯大林在俄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以及对马列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斯大林希望通过包括特殊移民在内的强制手段来改造小农，同化融合少数民族，最终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目的。但他的这一作法反而加剧了苏联的民族隔阂和农业的凋敝，为苏联的最终瓦解埋下了隐患。

三、斯大林的心理、个性和善恶价值观与特殊移民政策的缘起

首先，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时至1930年代，苏联境内还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对苏维埃政权持敌视态度的党派，如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残余；20年代俄共党内出现了一系

列反对派,如托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白卫分子,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农村中还存在有富农残余;尤其是那些分布在边境地区的诸少数民族,等等。在斯大林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外国敌特渗入苏联境内,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土壤”。就国际形势而言,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德国法西斯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而一旦苏联遭到外部入侵,国内反对派必然会乘机兴风作浪,与外部反苏势力相勾结,发动一场内战,从而威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鉴于国内外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必须防患于未然,即将这场必然要爆发的内战人为地提前。^{[121](P8)} 在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之际,国家便主动发起这场内战,消除国内的潜在威胁,对包括富农和诸边境少数民族在内的反对派实施镇压,将其作为特殊移民、政治犯、流刑犯等特殊人口迁往国家边远地区。这样,既威慑了政治反对派,又为边远东、北部地区提供了便宜的劳动力,以利其经济开发,缓解国家东西部经济和人口的不平衡状态。

其次,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价值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大善可以不避小恶”。但凡政治人物往往都会以上述理论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为了避免大恶,他们常常会允许自己与小恶妥协,甚至以此来达到所谓“美好的”目的。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小恶”论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很容易被人,尤其是当权者所利用。政治家们手中都掌握着为自己服务的宣传媒介,并常常会以以此来误导和蒙蔽社会舆论。他们已习惯了这样的作法,且屡试不爽,从而导致其政治声望虽如日中天,但个人道德却每况愈下。这种政治家的职业病在斯大林身上同样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促使这种职业病在斯大林身上愈演愈烈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内战时期一系列革命实践在斯大林身上所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迹,比如红色恐怖和枪毙人质等。其二、战争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苏维埃国家,其规模一定会相当巨大——这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大恶”。“西方民主”国家纵容各种反苏维埃势力,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随时准备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让革命者肝脑涂地、血流成河。法西斯德国灭亡苏联的狼子野心和战争准备早在20年代便初现狰狞。到了30年代他们的这一险恶用心更是昭然若揭。德国法西斯的目标并非只是颠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彻底灭亡俄罗斯民族。如此可怕的前景沉重在压在斯大林心理天平的一端,不可能不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渗入这样一种概念:那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作出再大的“恶”,只求使天平向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倾斜,即使这些恶都是自己的主观臆测也再所不惜。正是基于这种政治逻辑,促使苏联最高政治领导人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特殊移民运动。

斯大林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至死他都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这就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所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所有上述事实都是在斯大林、在他的领导、同意、认可下实施的。在斯大林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防止敌人渗透和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都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不得已之举。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剧所在!”^{[13](p164)}

最后,暴戾的个性。斯大林的特殊移民镇压政策,理所当然与斯大林个人刚愎自用、野蛮、粗暴的性格密切相关。其暴戾、多疑的个性无疑要对特殊移民运动的发动承担一定责任。

早在去世前夕,列宁在其著名的政治遗嘱中就曾对斯大林的粗暴性格表示过担忧,并建议将斯大林调离关键领导岗位。列宁在处理党内斗争等内部矛盾时根本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毫无报复之心,甚至也毫无怨恨之感。众所周知,当1917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时,列宁曾经毫不客气地抨击了这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后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时,他们立即就在苏维埃政权的机关里担任了要职。

与列宁不同,“斯大林是个很善于隐藏自己情感的人,爱记仇,极爱报复。早在1918-1923年党内斗争期间,他就突出地表现出过分的不顾情面、粗暴和不守法纪。斯大林很少关心如何把论敌说服过来,并吸收他们一起工作。他总是竭力使论敌服从自己的意志,摧毁他们的反抗。他的论敌始终是他的

私敌,甚至当对方已然服输并表现出共同工作的愿望时,他也还是如此”^{[6](P46)}。

在处理包括特殊移民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内政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遵循了模糊一切、怀疑一切和仇视一切的政治逻辑,违背人类道德准则,一味蛮干,从而使自己的理论走向了极端,滑入了谬误的泥淖不能自拔。这充分体现了斯大林性格的残暴,劣根性及其个人品质中一些极其有害的东西。他无视法律的特殊移民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13](P59)}因此,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家的落后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催生了特殊移民现象的产生。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从而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国家败亡的历史教训无疑对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M], М., НАУКА, 2005г.
- [2] А. Б. Суслов,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 истории[J], 2004, №5.
- [3] 金雁著,《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
- [4] 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C],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 [5] 王晓菊著,《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961—1917)》[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 [6] 罗·梅德维杰夫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 [7] Г. М. Иванова, ГУЛАГ в системе тоталита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M], М., 1997.
- [8] 《斯大林全集》[M], 中文, 第1卷。
- [9] 《列宁全集》[M], 3版, 第4卷。
- [10]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т. 37.
- [11] Ленин В. И., ПСС, т. 41.
- [12] Б. П. Курашв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сталинизма//История СССР[J], 1989, №5.
- [1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J], 1989, №3.
- [14] 黄军甫著,《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 俄罗斯研究[J], 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陈 扬)